

·科技界声音·



图片来源:中国物理学会网

一天,我的房间外有人敲门,进来一个人问我:“常元启和甘子钊在么?”我说:“常元启出去了,你找他干嘛?”那个人说:“学校通知我说这两个人是我的研究生,下礼拜才宣布,这礼拜我们科研组有个会,我想既然你们做了研究生,就干脆去听听吧”我当时并不认识他,迟了半天才问他:“您是谁啊?”他说:“我是黄昆呀,你都不认识啊?”我说:“我真不认识,不过我在北大五年了,您名字还是知道的”,就这样,算是入了黄昆先生的门,做了及门弟子。在当时,我们都敢对大牌教授这样说话,现在的学生哪敢呀?现在的等级差别太厉害,大牌教授连面都难得一见,别说来宿舍里找学生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 甘子钊
《851M 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算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7 月

哲学家告诫人们:当你把肮脏的洗澡水倒掉的时候,要小心别把洗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了!科学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它不断地承受着大浪的淘洗,又不断地吸纳着新的营养。一部科学史不是简单的新理论推翻旧理论,而是千百位科学家薪火相传的奋斗推动着各门学科不断地经历着浴火重生。

——上海大学化学系教授 浦家齐
《科学时报》[2009-08-14]

我现在还部分保留了 20 世纪 80 年代理想主义一代的色彩:对国家的发展抱有很高的期望,对现实中不合理的事情保持批评态度,并努力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些事情。我常常这样想:你要对今后的中国有信心,相信会越来越好,因为在一二十年前,你很难想象今天的中

国会取得这么大的进步。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朱彤
《科技日报》[2009-08-01]

教育就像我们的母亲,我们都是教育生出来的,要敬畏她。

——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清时
《中国青年报》[2009-08-11]

我们还可以想想:非要搞那么多评估不可吗?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至少有一百多年了。长期并没有评估,那时候学术发展得怎么样?民国时期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民共和国初期选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哪一个凭量化指标评估出来的?那时选得比较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回避,也没搞什么量化评估。是由高水平的同行互评出来的,评的确实八九不离十。世界上教育发达和学术领先的国家,哪个像我们这么兴师动众地搞“评估运动”?所以,是不是少做点评估,学术也能繁荣?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牛大勇
科学网 [2009-08-10]



图片来源:人民网

人不是技术的主人,而是现代技术的传宗接代者,技术通过人来不断地延伸自己,人不断地按照技术的逻辑来运作。结果人被技术赶着走,人对技术的不断创新实际上是技术实现自己的进化,人是技术进化的工具和手段。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吴国盛
《851M 我们的科学文化——科学的算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7 月

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总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体制方面的一些诱惑甚或压力,但这些诱惑或压力最多只能是影响其行为的外在因素,真正决定其行为的只能是其个人的意志力,而一个人意

志力的强弱显然取决于他个人的道德修养而绝非体制性因素。

——上海市生命法学研究会
秘书长 刘长秋
《科学时报》[2009-08-07]

中国学术界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之一,就是本来没有什么内容的东西,还被剽窃来剽窃去,当作某些人学术上的晋身之阶,而且居然还能得逞。

在这一系列问题中,应该说低劣的学术标准才是剽窃行为泛滥的根源。最让人厌恶的,其实并不是剽窃行为的泛滥,而是中国学术界学术标准低劣的事实。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研究员 王鸿飞
王鸿飞科学网博客 [2009-08-07]

我们这里(大洋洲和太平洋群岛)声名狼藉,有着可能是地球上最糟糕的灭绝记录。我们拥有令人惊叹的自然环境,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其中的大部分遭到破坏。物种因为栖息地的流失和退化,外来物种入侵、气候变化、资源过度开采、污染和野生动物疾病而面临威胁。

——新南威尔士大学环境科学家
Richard Kingsford
人民网 [2009-08-05]

在我看来,有时候作研究就像回到了孩童时代。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完全不去考虑其他而专心去探寻问题的答案。兴趣是最好的驱动器,成人之后的研究工作也应如此。纯粹为了利益的研究,我认为是做不出好工作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理论
化学家 Rudolph A. Marcus
《科学时报》[2009-08-17]

在大学本质上是属于大学人自己的时候,其中的任何欺骗或作假行为,都是对大学人自己的伤害。就像父母不会容忍、更不会纵容子女说谎一样,大学会容忍自己的教师或学生说谎或作假吗?为什么现在的大学会容忍甚至纵容自己的教师或学生作假呢?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大学是国家的,与自己关系不大。

——江苏大学教授 王长乐
《科学时报》[2009-07-17]
(责任编辑 李娜)